

26/

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

第2辑

长沙市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

1986. 12.

目 录

陈作新传略.....	周学舜 (1)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蜕变卞乾元口述 杨承庆笔录 (9)	
辛亥革命前黄兴在长沙脱险详情.....	梁湘山 (11)
洪赓飏先生轶事.....	洪 度 (15)
革命先烈宋教仁身后及其后裔.....	陈伯勋 (20)
记首任长沙市长何元文.....	吴昌继 (22)
日寇攻陷长沙市前后的片断回忆.....	易德文 (28)
日寇投降后长沙市北区巡视.....	黄 天 (33)
近四十年前的绿皮箱案.....	廖经池 (39)
湖南和平解放前的长沙市秘密电台.....	王 英 (54)
生花圃业话古.....	陈伯勋 (61)
中医界私办湖南国医专科学校.....	吴昌继 (65)
追记国术训练所师范班第一期学习生活.....	谢德扬 (69)
长沙市北区部分工商业及社会救济慈善事业 史略.....	刘志盛 (75)
《湖南和丰火柴公司》的兴衰.....	朱运鸿 (82)
李宋卿创办精益中医院.....	李素奇 (85)
百年老药店北协盛.....	张德文 (89)
乐陶大厦.....	邱石余 (94)
长沙基督教永恒堂简史.....	姚增谊 (100)
我所知道的基督教长沙圣公会.....	李遇恩 (102)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和张以藩.....	朱铁蓉 (109)
关于“三一小学”的点滴回忆.....	李遇恩 (122)
雅礼学会的成立和雅礼学校的创办.....	柳达文 (129)
长沙近代佛教社团活动记略.....	介 园 (139)
1954年参加长沙市街道社会调查回忆.....	陶英强 (149)
编后.....	(154)

陈作新传略

周学舜

陈作新（1885—1911），字振名，浏阳县人，原籍安徽。先世游湖南，遂家浏阳永安市附近。陈作新的青少年时代，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醉心科举，对八股、词章、勤学苦练，能诗能文，特别擅长书画篆刻。正、草、篆、隶四体字，都写得好，画的立石，可见三面；篆刻图章，人称“刀锋自然，古朴可爱”。

陈作新从十四岁开始，赶考过六次，仅备取一次；而帮助别人顶替五次，却中了三次。后来，他捐得一个监生，参加湖南乡试，他自己对写的应考文章十分满意；考毕对友人朗诵，人皆赞赏，都认为这次一定高中；可是发榜，依然“名落孙山”。据说他的文章曾经阅卷官推荐了上去，却被主考官以所谓“额满”勾销了。

陈作新在科场找不到出路，便以教书谋生。长沙名士彭梅生曾介绍他到李芳生家教书，每年束脩钱三十串，后又到贺家教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读书也很用功。他在贺家的藏书中，研读了《小仓山房集》、《吴梅村全集》和《龚定盒全集》等书，尤其是在李家的藏书中读到了《船山遗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和《海国图志》等书，民族意识得到启迪，眼界为之大开。后来，又协助彭梅生在长沙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看到了许多翻译的新书，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也开始有所了解，因而思想逐步

转变。

一八九七年十月，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陈作新满怀热忱，准备投考；不意事先与顽固派绅士王先谦谈话时，语不投契，遭王呵斥，他忿而离席，放弃了考试。

一八九八年，谭嗣同等为鼓吹自治救亡。在长沙创办“南学会”，陈作新“肇陈新说，多所砥砺”。他又与一班爱国之士组织碧螺吟社，每每“张触时事，发为诗歌，多启人爱国之思”。这年九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王先谦等顽固派在湖南为虎作伥，陈作新忿忿不平。他好喝酒，每喝必醉，醉后放言，无所顾忌。由于深恶痛绝王先谦等顽固分子，他说，要做“山大王”，“一朝得势，定要杀尽这些老朽”。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一九〇〇年，陈作新化名程秉钺，投奔唐才常，参加了“自立军”。唐才常派他到安陆一带与会党首领许行健接头，许劝他加入会党，并说明只有加入会党，事情才好办，且保证抬举他做个“穿靴子上山的大哥”。陈作新当时视“会党是江湖流派”，担心“卷入江湖，那将是终身卷入漩涡，不能自拔”，拒绝参加。不久，回到武汉，把与许行健打交道的情况，详细向唐才常汇报了。唐才常对他说：“为事业卷入江湖，不同于无目的耍江湖，谭壮飞（嗣同号）为了想考查会党的起源和作用，曾亲身投进过许多不同宗派的会党，劝他再考虑参加会党的问题。

这时，唐才常忽接到崇、通“自立军”谢大哥因病回家的报告，正感到崇、通无人主持，便派陈作新前去接替。陈

作新当时大有率领崇、通八千子弟，会师武汉，痛饮于黄鹤楼的气概。无如变起突然，八月二十二日，“自立军”武汉机关被破，唐才常等殉难，“自立军”群龙无首，无形解散，陈作新扮作游学先生，逃回家乡。当时清政府列名通缉程秉钺，而不知程秉钺即陈作新，因而他幸免于难。

也就是这一年，陈作新在武昌与湖北新军教习辜天保（莽生）邂逅相遇，辜对陈说：“新军用的兵器，都是新式的，战术也是崭新的一套；今后作战，若以新对旧，旧军决非新军之敌，必不能在新军之前获胜”。陈作新深受启发，决意弃文就武。

一九〇三年，清政府发布谕旨：“整顿兵制，停止武科。亟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湖南当局，开办武备学堂，正式招生。陈作新满怀希望，身着军服，足蹬快靴，手提笔墨袋，走进考场。武备学堂总办俞明颐，亲坐公案，点名目测，扫视周身，不为青眼，陈作新败兴而归。好在这年十一月，武备学堂又附设兵目学堂，以培养新军骨干，陈作新经长沙贤士龙璋（砚仙）的推荐，才得进入了兵目学堂。

这年，湖南留日学生陆续归国鼓吹革命，从此湖南革命风气逐渐浓厚。长沙高等学堂学生陈宗海（邵阳人），在校内组织七人小团体，于贡院西街设立《俚语报》馆，发刊通俗语言小报——《俚语日报》，并翻印、散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革命读物，陈作新参加了《俚语报》馆工作，成为在湖南军界鼓吹革命之先行者。

十一月四日，黄兴等在长沙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次年春天，计议于慈禧太后七十生日（十一月十六日）发动起义，

长沙方面，原拟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军为主动，会党副之，届时由陈作新“将夺兵目学堂所储炮，集南郡同志应之”。因事先机密败露，起义不成。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黄兴即密函禹之谟在湖南成立分会，发展组织，推销《民报》，陈作新经由谢介僧、刘承烈介绍，加入了湖南同盟会分会。这时，陈作新毕业于兵目学堂，担任新军炮兵营左队排长，在新军中进行艰苦深入的策动和组织工作。《民报》一到手，他便从头至尾读熟，可以成篇或应段地背诵，向人宣讲，并将《猛回头》、《黄帝魂》等革命读物，封面题名“兵目须知”，在新军中秘密散发。

陈作新散发革命宣传品，被管带刘玉堂发觉，要将他逮捕，送协部法办，炮兵营督队官陈嘉猷奉令前往检查，有意维护，嘱其自动将书交出，在炮兵营医务所后面，迅即焚毁灭迹。陈嘉猷对刘玉堂说：“此事一经正式揭露，牵涉必多，闹大了，不可收拾，不如将陈作新调开，隐患于无形。”刘玉堂认为这办法好，借口陈作新不宜于炮兵，便把他调到四十九标二营前队，继续充当排长。

一九〇九年，四十九标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陈作新兼各班教官。他利用课堂，“藉授课时间，阐述民族主义”，在学术科授课时间外，士兵辄就私室请益，作新“藉循诱掖，全营同志，靡不忠义填膺，愿为用”他展转介绍优秀列兵安定超、李金山、刘光莹等数十人加入了同盟会；经常利用例假，率领目兵数十人，到岳麓山的白鹤泉一带秘密集会，讲解“兴汉排满”的道理，并推派代表向各标、营、队进行联络工作。他常借书写寿对、挽联等应酬事为媒介，

与一些长官接触，尝企图说服一些中级军官从事革命。可是那些军官，多热衷名利，很少有革命大志的，对陈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陈作新带步兵一排，在另一同盟会员新军管带陈强的率领下，开驻布政使署左近弹压，陈作新认为这是农民起来了，想乘机大举，他劝陈强趁机举义，说：“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陈强问：“陈排长，你讲什么呵！陈作新说：“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排长多咀。”陈强胆小，怕生事惹祸，累及身家，故装不懂，喊声：“护兵！张排长喝醉了酒，赶快送他回去！”不久，陈作新被革职了。

陈作新离开新军后，“义愤愈深，运动愈烈”。他寄居长沙寿星街培元桥李培心堂（李安国、藩国家），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同新军列兵保持密切联系，且常到小吴门外校操坪湖南陆军小学堂访问联合。为加强思想、组织工作，特成立革命团体“积健会”（后改名“积健社”），推李安国、藩国为负责人，以研究军事学为名，团结一批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常利用例假开秘密会议，讲解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宣传民主革命，“革命同志之团体，乃于此时潜布军界中矣。

与此同时，同盟会总部宋教仁等，谋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以策动长江流域起义，先后派遣刘文锦和吴任等同盟会员打入湖南新军，刘任马队排长，吴则充四十九标文案，对新军进行直接策动。从此，新军中开始有了一批革命骨干。由于工作深入细致，使得一般列兵思想进步很快，革命要求不断高涨，且组织也很严密，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这些代表都由士兵担任，除刘文

锦和吴任外，没有一个官长知道。

一九一一年春，同盟会总部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起义，先后派谭人凤、谢介僧、刘承烈等回湘谋响应。二月，陈作新与谢介僧、刘承烈等集会于长沙戴子桥刘文锦家，由谢介僧、刘承烈传达同盟会起义计划，陈作新原与刘文锦善，此后更加密切合作，遂分工负责联络军队。不久，焦达峰、杨任等赶到长沙，在南门外晏家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革命机关，约集曾杰等在长沙的同盟会员共决大计。

为响应广州武装起义而进行军事部署，在陈作新策划下，由刘文锦出面，于三月三十一日，在天心阁召开了一次有标营代表七十二人的会议。这次会议，被巡抚衙门的暗探唐满老鸦所侦悉，当即报知巡抚杨文鼎，杨担心操切过急，激成巨变，于是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刘文锦撵走。

由于天心阁会议事泄，湖南反动当局对革命党人防范愈严，焦达峰等也因长沙不能立足而被迫离开。不久，黄花岗之役失败，不少同盟会人感到沮丧，陈作新为稳定情绪，约同志集会于清水塘，以定“持久之计”。至是，陈作新的责任愈重，他独立苦撑，使军队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接着，暴风雨般的保路风潮兴起，湖南民气空前旺盛。这时，焦达峰等也从武昌回到长沙，决计乘风潮起义。七月底，成立革命机关于落星田定忠客栈，焦达峰委派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除加紧与新军的下级军官联络外，并与各兵种的正副目接头，积极准备起义。陈作新受命之后，又得到龙璋在经济上的支持，精神焕发，他积极活跃于小吴门一带茶楼酒馆中，并与新军代表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杨玉生、刘芝德等在小吴门外军路侧，秘密组织“日新社”，悬挂着

日新成衣社的招牌，备缝纫机两架，配几个成衣工人，物色了部分军属妇女以资掩护，作为联络军队的机关。后来起义时所用的旗帜，就是由这里赶制的。

陈作新外号陈梦天，他放言高论，自称与革命首领孙文和黄兴都是拜把兄弟，说 he 自己是湖南十大头目之一，事成之后，他就是湖南的镇统（相当于师长）；又说革命党已托英国、法国和日本的兵舰运进炸弹四十箱，机关枪四十挺，马枪二千杆，手枪三千支，大家信以为真，精神振奋，斗志更为昂扬。一次开会前，他对人说：“孙文派了他的参谋杨任到湘联系，大家将会看到一个翘胡子，就是杨总参谋，届时，杨任、成邦杰和杨守箴等到会，翘胡子杨任受到代表的热烈欢迎。

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加速了湖南起义的进程。革命洪流，泥沙俱下，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见风驶舵，赶紧摇身一变，向革命派投机，装扮成拥护革命。十二日，谭延闿的心腹，由盐商起家的富商黄瑛，向陈作新提出附和武昌起义的要求，并答应支援三百元的运动费。陈作新对黄瑛说：“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有巡防营和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十三日，陈作新与安定超等八人，拟集会于紫荆街福寿楼，因发现抚署之暗探，改于十四日午前，在通泰街玉皇殿坪陈作新住宅开会。这天晚上，由陈作新出面在杨家山小学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湖北革命政府来湘代表蓝综、庞光志也应邀出席。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群情激奋，当即决议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起义总责。并决定军分二路，于二十日起义。后由于会党兵马一时难于赶到长沙，又展期至二十

三日。

二十一日晨，陈作新得到警报：饶运钧运动巡防营被捕，巡抚余诚格采纳巡防统领黄忠浩的建议，拟于次日将新军一律调离长沙，而调巡防营入城，图谋一网打尽革命党人。时危事迫，焦、陈当机立断，遂决产二十二日起义。

二十二日晨，在焦达峰、陈作新的指挥下，长沙新军揭竿而起，按原计划，分二路攻城。未响一枪，长沙一举大定。

“须臾满城白旗，商民安堵，颇有市不易市之概”起义胜利后，各代表集议于咨议局，一致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于是成立。

湖南都督府的当务之急，是出兵援鄂、援赣。焦达峰、陈作新决定悉派新军赴援。王隆中统率四十九标新军首途北伐后，陈作新自告奋勇兼援赣军总司令，整装待发。这时，有人建议酌留首义队兵警卫，陈作新慨然曰：“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

三十日，陈作新因与成邦杰、阎幼南等讨论练兵与北伐问题，兴致勃勃，挥毫写下“练兵先练将，擒贼必擒王”的联语，赠与成、阎。他在联旁写道：“目前与诸友谈北伐，成邦杰谓‘擒贼必擒王’……倾因筹备援赣，同军务部商谈整军，阎幼甫将军谓‘练兵先练将’……因思‘练兵先练将’与‘擒贼必擒王’二语，确系革命建军与北伐作战最重要之指导原则，巧合成对，爰制线篆联，分赠两将军，以当惠壤。”

三十一日，陈作新在咨议局研讨援鄂、援赣的会议刚结束，立宪派已设下谋害的陷阱。制造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

潮，诡称要副都督亲往弹压。陈作新便骑马而出，路经北门文冒阁附近某成衣店门前，突然被预伏的刽子手所包围。一凶手持刀劈伤陈的左额，陈拔枪不及，落下马来，突入成衣店，取板凳一条，朝凶手砸去，再一凳，将凶手砸死，而他自己也连中几弹，倒地气绝。与此同时，焦达峰亦被匪害于抚署前坪。陈殉难时，年仅二十六岁。

大革命时期 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蜕变

卞乾克口述 杨承庆笔录

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分校在教育会坪南边隔一条马路的原贡院内成立了。那时我在长沙师范十四班读书。这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考取了国民党分校。该分校是培育革命干部的一所学校，在当年四月初开学。开学那天，在开学典礼会上李维汉同志到会讲了话。校长是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兼任，由省政府代主席周斓代理一切，教务主任是李达（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党务主任是凌炳，训育主任是谢觉哉。学生共有一千多人，工农班学员队队长是何长工。

分校学习，上午为学科，下午为术科。学科的课程为共产主义ABC，人类进化史，政治经济学等，术科是军事训练，内容为步兵操典等。是一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当队长，李达、谢觉哉、薛暮桥都担任教课。其中薛暮桥教经

济学，一面滔滔讲述，一面反手在黑板写提纲或笔记要点，其学识渊博，至今我尚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们全校同学正在热烈地学习，都准备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时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国民党反动派都在暗中串连，磨刀霍霍。先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屠杀革命志士和革命工人，接着长沙军阀许克祥等人蠢蠢欲动，长沙红五月开展了赤色宣传周，各界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不久反动军阀在市中心八角亭、司门口一带筑起了沙袋阵地，准备军事行动。五月二十一日（马日）白天，我的二姐来看我，告诉我，外面风声很紧，嘱咐我要特别小心，听说有人对我们穿军训制服（党校学生都是兰色军帽和兰制服）的人，要进行攻击，我听了心里疑虑得很，但是到了天黑以后，却显得特别清静。半晚上，我起床小便，不料那站在寝室外面的卫兵突然举枪向坪上开了一枪。枪声响，同学们从梦中惊醒，惶恐非常，有的爬在地板上，有的往床下躲，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口吹哨子，并高声喊道：“学员们不要动，不要怕，我们是唐总司令（这时唐已担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派来的，只抓头头”同学们都躲在寝室里，我偷偷跑到自修室一看，每个桌屉都被打开，里面的东西都翻转了，我的抽屉全空了，包括放在里面的一张汇票也被盗。时间进入下半夜，外面枪声不息，间或还有机枪声，听说有两个同学想逃离学校，在翻越靠水风井那边的围墙时，被打死了。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我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分校，到余家塘某旅社找到我的哥哥，我因疲惫不堪，倒头就睡，直到中午，有个姓李的分校同学来通知我，要我赶快回校捡东西。待

我到校时，学校已被捣毁一空，我的被褥等物全丢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分校。我们一千多人热情地学习，对投身革命事业的愿望，一夜间竟化为乌有，怎能不令人感慨？

马日事变后一个月光景，反动派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恢复分校，表面上通告原来学生来校登记，再行开课。除少数人受骗，有头脑的革命青年是不会再跨进那张门的了。

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原地继续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由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分校蜕变为训练反共先锋的场所，国民党湖南省党校。马日以后全省各县党委和省党部重要干部全部都是该校毕业学生。

辛亥革命前黄兴在 长沙脱险的详情

得圣公会会长黄吉亭等掩护经武汉平安到上海

梁湘山编写

黄兴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于1903年5月31日离开日本回国，六月初到达上海，为掩护革命活动，在上海参加了几次圣公会圣彼得堂的宗教仪式，认识了该堂的中国籍会长吴国光。当时留日的湘籍同学胡元侠正在上海为长沙明德中学聘请教员，黄兴也正想回湖南组织革命活动，便欣然同意来明德学堂任教。这时原两湖书院的同学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创办的革命刊物“苏报”被清政府查封，于是二人同回湖

南。黄兴受聘为明德中学体操教习，在师生中宣传革命，同时持吴国光的介绍信到长沙圣公会记名加入教会以作掩护，也参加该会黄吉亭会长所办的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1903年冬黄兴与宋教仁、周震麟等人以办实业名义，组织华兴公司，在南门租屋设革命机关即“华兴会”，联络学界军界及会党，积极筹划起义工作，准备于1904年11月18日（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省城文武官员齐赴“皇殿”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

由于会党人数多，人员复杂，以致秘密外泄，为清政府所侦悉，因此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坏，长沙县、将衙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非常紧张。

黄兴家住北区紫东园，他在农历九月廿五日，得知清政府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后，即去西园北里龙绂瑞家。当时华兴会骨干周震麟、张继正在龙家吃午饭，黄兴便将起义之事已经泄露，军警到处捕人等情况告诉他们。大家商量当即决定请金祝华去宁乡中学找曹亚伯来龙家，共商黄兴脱险的办法。曹亚伯经常出入教会，与教会人士如黄吉亭会长等较熟。曹得信后即乘轿去龙家，时已天晚，途中各街栅栏均已加锁，但曹亚伯穿西服又无辫子，守卒以为是洋人，便都开门放行。龙家的门外也已有警卒守候，但因龙绂瑞的父亲是退职的刑部侍郎，长沙有名的大士绅。警卒不敢盘查。曹亚伯乘轿直入花厅，见到黄兴等人，得知事态危急，曹劝慰一番，并确定黄兴到长沙圣公会暂避一时。如是随即乘原轿去吉祥巷圣公会，沿途各栅栏仍照样放行。曹亚伯来到圣公会后门，急促叩门。黄吉亭会长的住房临近后门，听到这急促的叩门声，很感警惕，祈祷后才开门，曹亚伯进去后，将黄兴的危险处境告

诉黄会长。黄立即穿好衣服，乘曹来时的轿子，曹亚伯跟随在轿后一两来到龙家。黄会长先以安定的语气安慰黄兴，然后便和他的朋友龙续瑞、金祝华、张继、李莲舫等人讨论脱险的方法，并表示决尽力保证黄兴的安全，同时告诉他们，在黄兴转移后，无论何人都不得问及他的行迹。第二天风声更紧，同谋的会党游得胜、肖桂生又相继被捕。晚上黄会长再去龙家，商量黄兴出龙家的秘密行动，如何躲避门外守候的警探耳目。第三日下午六时，黄会长自南门乘小轿放下轿帘，装作女眷探亲一样，来到龙家直入内室。随后让黄兴乘原轿经小巷到吉祥巷圣公会后街一娼妓家门口下轿，再转入圣公会后门的小巷，随轿冒充随从的是张继。黄会长则先赶回，几次变换衣服出圣公会大门探视。曹亚伯则守候在圣公会后门接应。下午六时十分黄兴来到后门，二人携手进入圣公会，黄会长引他们登上后进的楼上，楼上仅有一行军床、一小桌及一小凳。

游得胜及肖桂生二人几经酷刑，最后供出华兴会的一些会员，而黄兴则名列第一。长沙府、县均根据名单派兵搜捕，并特别悬赏通缉黄兴。曹亚伯却仍照旧奔走于圣公会和日和会，因他当时尚未正式加入华兴会，并且还是个基督徒。

黄兴藏在圣公会将近一个月。其闻黄会长恐怕他自己家属受官府警卒的滋扰，便在圣公会附近租一房屋给自己一家居住。每礼拜又要他们来圣公会参加宗教活动。清官府见他一家都是基督徒，也就不敢下毒手，这也是当时不平等条约所产生的“官怕洋人”一股“政风”。久之长沙搜捕黄兴的风声逐渐松懈。

黄兴独居楼上，却一刻也没有忘记革命事业。总想能离

开长沙以便进行革命工作。这时正好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兼武昌日知会会长胡兰亭来到长沙。黄吉亭与他商量送黄兴安全出长沙的办法。黄兴本蓄有胡须，胡兰亭将他的胡须剃掉。黄吉亭又去对河一海关人员邓玉振家，借他的房子办酒请客。待黄昏城门将关未关时，黄吉亭与黄兴、袁礼彬三人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出城赴宴，同时又偕日知会的几位会员也出城参加邓玉振家晚宴。临行黄兴告诉黄、袁二人：“如路上遇到危险，就请你们二位躲避，我当以自卫手枪与敌人拚命。”出圣公会后，幸好一路无事，安然到达邓家。黄会长向邓玉振介绍后，邓极为高兴。这天晚上有日本日清公司轮船“沅江丸”开往汉口。他们晚宴后即登上日轮，介绍船上一重要船员蔡植生。蔡满口答应妥善照料黄兴，黄会长也亲自陪同送去汉口。早上四时“沅江号”开船，当晚九时安抵汉口。他们随即雇一小船，赶上停在江心即将开往上海的招商局轮船“江亨号”，黄会长送黄兴上了“江亨号”后，嘱咐他到上海后即来一电报，只拍一个“兴”字，便知道已平安到达上海，使同志们放心。黄会长告别黄兴上了原来的小船，直到“江亨号”轮船开船离开汉口，才又登上日本轮船返回长沙。几天后上海的“兴”字电报来到圣公会，黄会长随即转告同志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庆幸黄兴平安脱险。黄兴原名黄轸字庆午后字克强。在明德学堂教书时又名黄董午，大家都叫他黄董午老师。